

仁学知行录

我的思想历程纪略

李幼蒸 著





正文：我的思想与行为之历程

1936-1945 北平，城固，兰州，重庆

●1936出生后几年间随家庭逃难至西北。1936年11月11日我诞生于北平德国医院。父亲李蒸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母亲王佩秋毕业于天津女师，婚前曾任外国人中文家教，婚后持家。父母婚礼举行于中山公园。我诞生的次年发生卢沟桥事变，父母分头逃离沦陷前的北平。母亲与弟弟王振声、王振刚带着我们兄弟姐妹4人辗转逃至陕西城固，与带领师生撤离北平的父亲会合。父亲初为西北联大三常委之一，其后北平师大部分与联大分离，并在城固以西北师范学院名义继续其教学活动。城固时期是我最初有记忆之始，下一个略有模糊记忆的片段是40年代初我家随学校由城固迁校兰州时所乘敞篷卡车在华家岭翻车，我遂记住了华家岭这个地名。那时我已四、五岁而记忆仍极模糊，可证自己不是记忆力强者。在兰州十里店西北师院附小读书以来，记忆有了一些连续性，但也极不完整。住宅都是土坯屋，墙上画有防狼的白粉圈。屋后是枣树林，印象较深，因与小朋友常去那里打枣玩耍。屋前较远处是黄河，河上来往着羊皮筏。黄河边也是我们常去戏耍之地。幼时生活于抗战艰困时代，穷乡僻壤，不记得有任何玩具或童书，更无美食记忆。父亲去城里办事都是乘马车，坐在大车沿上。家中用水是工人从河里挑来后再用白矾漂净后使用。所以幼年黄河边的日子是纯粹乡野生活。我对小学两三年级的课堂生活竟然毫无记忆，所记住的些许片段都是孩童游玩时留存下的模糊印象。到重庆时为止，我看过的唯一一部电影是《木兰从军》，我还记住了主题曲“月亮在哪里”。

●1945重庆亲历胜利日举城欢腾。1945年初或中期，因父亲调职三青团中央举家迁往重庆。父亲为教育事业家，以为可在中央领导的全国青年系统传布美国教育理念，可为国家教育事业之扩展贡献心力，岂料到进入政治领域后一切均运行于党政军复杂关系，更不知中国历史即将经历巨变。【父亲掌管北平师大和西北师院之时，惟知努力办学，不涉政治，素来遵纪守法，故在接管学变频仍的北师大后，整顿校风成功，自然成为激进师生不满对象。据查，1935-1936北平学运和西安事变大动荡时期，父亲遵照校规和法律开除过“进步师生”，故于1949年后受到时已走红的当年进步学生的抨击，仅因统战政策之故得以幸存。】我们家属搭运输机抵渝，最初住在旅社，旁边有一剧院，我曾偷偷溜进剧院看过《孔雀胆》话剧。在重庆旅社早餐第一次吃到花生米，竟然记住此事，可见其前在兰州生活之艰苦。在重庆我们住进两路口附近山坡上分配到的三间竹坯房内，每日走山路上学。在住家院子里可俯瞰沙坪坝机场飞机起落。在重庆时最深刻的记忆是日本投降日万民欢腾的景象。生于抗战前一年的我，整整“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全时段，而只有这悲壮历史的最后一幕为我所亲自“目睹”。【后来得悉，妻子方谦一家那时也住在重庆兵工署宿舍，其父被中央派往新德里承担转运战时资源的工作，经常飞越重庆与新德里两地。】我对在重庆短期上小学的课堂也是毫无印象，只记得上下学路上与同学打麻雀后烤烧之事。父亲虽然调职中央，无论作为校长还是作为公务员，自抗战以来迹近贫困阶层（故教育界与党政军要员的经济条件完全不同）。母亲时常对我们回忆三十年代在北平的舒适条件，抗战以来，一切烟消云散。抗战八年，我家也与文教界千千万万人家一样，生活在物质艰困条件下。我们孩子自幼也从无任何物质上的奢求。对我的幼年成

长而言，也没有接触过任何可提升精神营养的机会。我个人的心智成长开始于南京时期；父亲随政府还都南京后，全家迁至首都，我自此才真正生活在都市环境中。南京成为滋养我的精神生活之地。

1946-1949 南京，北平，杭州，上海，天津

●1946-1948南京小学生活。我家随政府由重庆迁往南京的过程，那时已9、10岁的我竟然没有什么印象。到南京后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住在旅社时吃到小贩卖的香蕉。不久后我家被政府分配到国府路碑亭巷石婆婆庵慕慈医院7号一处老旧小楼内。【后来与岳母核对照片后确认，后来的妻子方谦即于南京沦陷前几个月诞生于慕慈医院，那时他家也住在此同一小楼的楼上。】我读的是国府路新生小学。我对两年多的小学情况几乎全无课堂记忆。我肯定不是好学生，不喜读书，不做作业。而父母从不过问成绩之类。在高小期间，除了到隔壁里弄杨将军巷口租借小人书外，也开始随兄姐读翻译小说，如《小妇人》，《小男儿》，《侠隐记》，《顽童流浪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这些小说也是那个时代学生们普遍喜欢读的课外书籍。而另一影响精神成长的则是看美国电影。我记得经常逃英语课去到太平街某影院看西部片，但去的最多的是附近一处忘记名称的文艺电影院。在我少年时的文艺爱好中已经呈现一种分类意识：娱乐性的和文艺性的作品。后者最初多半是受到哥哥李小蒸和姐姐李溪桥的影响【在南京时哥哥上新生小学旁边的一所教会学校，姐姐上金陵女中。他们两人1949年北大外语系毕业后都在电影研究界工作；也都由年轻时的美国电影迷不得不转变为研究苏联电影】。由于我那

时迷恋西部片，崇拜泰伦宝华和亨弗利包加，在慕慈里大院里我与小朋友们也经常扮演强盗警察游戏，有如今日孩子热衷于电玩。（那时一起玩的同伴有刘全生，他后来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访学以后我大概总是在院子里与小朋友玩耍，从来没有做功课的念头。上学对我纯粹是混日子，不喜欢上学，这几乎是自小到大一贯如此。【长大后开始“读书治学”后，读过无数文人学士自幼博闻强记，勤学苦读之事，才知道我如生于旧时期必是不可能通过逐级考试博取功名者】在三年来的南京生活中最温馨的记忆是夏季父亲带领全家到玄武湖游船和偶尔去夫子庙大集成餐馆吃饭。父亲不善置产，除工资外别无收入。而战前战后，不能相比。我家毕生唯一一段富裕时期均发生在三十年代的民国“黄金十年”。随着抗战爆发，家境每况愈下，到了战后在南京安家后，也几乎是家徒四壁。但南京时代无疑是我最为快乐时期，四十年代末的南京也是我的性格成长期间最有影响力的外部环境，翻译小说和美国电影应该是当时我最主要的精神资源。（也可见物质丰裕并非幸福的主要原因）。大约三年间的南京生活可以说是我一生回忆起来最感温馨的时光，后来每过南京时都有昔日不再来的惆怅之感。【父亲好友蔡堡教授的长公子蔡仁候（杭大生物系教授）在文革期间给我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每当走在南京街头，都是“一步一回头”。因1948年前他也曾在那里生活过。】

- 1947回到出生地北平。1947年我与两个妹妹李长乐，李梅随父母经上海乘轮船去北平住过几个月，在北平住在罗贤胡同四合院里【这个院子后来成为我们五十年代后住地所在地区的街道办事处】。这是我诞生10年后第一次回到出生地。在北平的几个月里，见到了来自唐山古冶乡间的祖父，我们还一同乘黄包车到西

单看过电影。我们也在天津姨母家小住（马场道199号，这也是我两年后在天津读小学时的住地）。姨夫田勃然为某洋行襄理，表姐田玉珠，表哥田少然，算是那时亲戚中有些来往的。（他们一家49年后每况愈下）。此次北行之记忆最清晰者为途径上海候船时在法国公园内与父亲互抛垒球玩耍以及海船行驶间首次吃到西式餐点。我还记得父亲在上海或在船上得到朋友赠送的100美元。在我那时的头脑中，这应该是很多的钱，可见我那时毫无金钱概念。

- **1947南京中华民国宪法实施日记忆。**1947年正当中华民国正式制定宪法并民选总统副总统之时，我在南京遂“亲自见证”了民国历史上的另一重大历史时刻。我每日上下学时都听见无线电里的副总统唱票声音（孙科，李宗仁两个名字那时已经牢记，因上下学路上一直听着无线电里的唱票声）。三青团解散后，父亲开始到北平参加区立法委员选举。他大概以为立委相当于美国议员，遂可以文人身份在新颁宪法下在“议会”内参与民主政治活动，从此可以通过理性议政为国家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但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料到时局会突然逆转。从45年离开兰州到达重庆起，可以说他的每一步骤都非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无法逆料的历史洪流中随波流荡。抗战前在中国大陆教育界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如其在给母亲的“定情诗”中所流露的），仅能曲折地体现于三十年代整顿北师大和抗战八年在西北筚路蓝缕创学的奋斗中。父亲出身于北平师大，工作于北平师大，师范教育为其终身志业，以为国家发展，端赖民族教育水准的普遍提升。此一志愿，其实无论后来从政与否，都因中国历史巨变而无法实现。

- **1948随母亲逃难至杭州。**1948年下半年时局突变，全家再次面临逃难时刻。我也须与大院中好友们告别，其中记住的有刘全生

和游戏时常常扮演女伴的吴承丽（其父为一将军）。我还清晰记得临行前一晚到她家楼下唤她出来见最后一面的事，这大概是我在南京两三年来最后记得的一件事。除父亲与哥哥留在南京外，母亲带着我们乘火车经上海赴杭州暂避。我们借住在父亲留美时老友生物学家蔡堡家。住址是庆春节刀茅巷75号。我随身携带的自己的收藏品有邮票和几本翻译小说，那时我已自以为有了“文学爱好”。只因我一直生活在电影与小说烘托的想象世界里，我的1948年杭州之行，竟然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某日在院中玩耍时听到大铁门外有敲门声，我去开门时，见到两位小女生来为淮河水灾募捐（其中一位多年后成为我的妻子，即方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大概记下了她们的名字和学校，并要求母亲安排我和妹妹到刀茅巷海星小学插班读书。在海星小学读书的几个月中，是我有生以来思虑最一贯的时段，心心念念想与住在不远处同一刀茅巷的76号宅邸里的女孩来往。但当她感觉到我的异样表现后，开始特意与我疏远，此种疏远的一贯性也越来越明显，我于是陷入平生第一次（自以为是的）“忧郁”中。我开始经常在他家大门前徘徊，等待她的出现。然而我的举止只会进一步坚定了她的拒斥态度。我们之间就这样在心理上“拉扯”了半年。对于十一二岁的少年来说，此一长达半年多的连续集中念想，几乎是无以解释的。我是指长达半年地将精气神专注于一个并无任何了解的对象上。1949年春全家离杭赴沪的那天清晨，我怅然若失地在75号大门前不忍离去。而心中的“依人”仅仅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念而已。如果幼年恋情不必作真的话，其中确有意义的因素则为“追—斥”张力的持续性和凝聚性本身，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持久怀念之理想执着性。我在火车驶离杭州时最后一道站名艮山门，也竟成为我永远记住的地名之一。当然杭州的许

多去过的地点名子都成为我这永恒梦都的符号：西湖电影院，知味观，楼外楼，当然还有教会小学海星。1948-1949居住杭州这大半年里，正是天下巨变前夕，我自然对此一无所知。【那时杭州所居地附近浙江大学正在如火如荼地鼓噪着学潮，不少青年学生都卷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运中，包括后来成为我在哲学所同事的范岱年及其好友许良英。我在海星小学的同班同学丁兰生，那时也参加浙大学生导演的夏衍之《上海屋檐下》，妻子保留有多张话剧照片，令我联想到1948年大动荡时期连小朋友都和地下党大学生在一起，而我对周围浙大子弟所参与形成的时局氛围毫无感受，虽然我听到过他们喜欢唱的歌曲“我们是兄弟姐妹……”。】海星小学里不少都是浙大教师的孩子，我和他们玩不到一起，而是与同是来自南京的袁明中来往。我的心思一直绵延于自己制造的个人世界里。而杭州岁月在我一生中的特殊性，在于一个少年具有的反常的精神专注性表现：何以会如此莫名其妙的“一见钟情”如此？因对方是天真的小女孩，对于我的怪异表现避之唯恐不及。由于女孩对我拒斥得如此彻底，我即不应有任何理由在离开杭州后多年延续着此一纯粹“想当然的”情愫。而杭州的遭遇竟成为我日后继续编织理想树的根源。在到达上海后不久，岂知我的杭州故事已然滑入前一世界了。然而我们在75号铁门边的“初遇”以及我在76号大门前的告别，都已成为民国时代往事了。

●1949父亲参加国共和平谈判代表团；家庭历史路线的骤变。父亲纯因偶然原因被突然推举为国共和谈代表团代表（因原拟团员彭昭贤为中共方反对，故改以无党派色彩的父亲顶替），可谓历史的反讽。就具体政治情势看，此一所谓和谈纯属无谓之举，因彼此胜负之局已定。代表团6人中除父亲外，均为党政军要员，

并均素与中共交好或早有秘密关系。代表团中一秘书演员金山为中共特工，会谈中每晚偷偷将政府方人士言论和态度密告中共方。6人中惟父亲一人有留美背景，因属教育界本来无关于党政军权势间之角力，且根本不知其他代表与中共有何真实关系。但如超越政治现实而从全国人民福祉角度看，父亲虽不代表党政军势力，但确可代表文教界及普通大众之和平心愿，其参与和谈遂具有了另类象征性意义：代表广大文教界人士的和平心愿。虽无从查看相关记录档案，据悉金山汇报的材料中父亲最初的表态是：中共条件自然相当于要求国府投降。在和谈过程中父亲以为是在自由表达意见，而当张、邵等态度明朗后，才知自己的真实处境（从最初据公理议事，到终于明白大家都在按势力进行交易）。此一客观情境决定了父亲此后的生存方式，团进团出，并无个人独立选择之余地。【由于父亲在和谈中的“不迎合”表现，以及父亲以前在教育界一贯遵法行事的作风。据父亲带到代表团秘书处的肖金平后来告诉家兄说：请转告父亲对“组织”要亲近些，因代表团某秘书透露组织上对父亲的“清高”以及对其素不“进步”不以为然。文献记载1936年北平各界庆祝蒋先生脱险的大会上积极表达庆贺者中就有家父的名字，故至今遭致中共学者点名批判。在一二九运动中家父作为一校之长，立场当然也是站在政府方面的。肖金平告，1949年后中共曾考虑将父亲排除于“政协”系统，不予任用，后因张力言不可，才“安全了”下来。至于父亲是如何从其美国民主崇拜转为“中共民主人士”的，我自己没有任何直接了解。因父子之间从来不深谈政治。所谓“安全下来”是指，他如一直留在西北教育界，在历次运动中也必遭个人屈辱与伤害，而因被归类为无足轻重的“民主人士”后，反而免除了诸种身心伤残。我家49年后多年居无定所，经济拮据，父亲最后落脚于大